

KAITUO YU CHUANGXIN

# 开拓与创新

## 宋史学术前沿论坛文集

包伟民 戴建国 主编

中西書局

KAITUO YU CHUANGXIN

# 开拓与创新

宋史学术前沿论坛文集

包伟民 戴建国 主编

中西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拓与创新：宋史学术前沿论坛文集 / 包伟民，戴建国主编. —上海：中西书局，2019.6

ISBN 978-7-5475-1600-3

I. ①开… II. ①包… ②戴… III. ①中国历史—宋代—文集 IV. ①K24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27620 号

---

---

---

## 开拓与创新

——宋史学术前沿论坛文集

包伟民 戴建国 主编

---

责任编辑 吴志宏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邮编 200040)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42 000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600-3 / K·303

定 价 98.00 元

---

---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021-64709974

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中国史)建设经费资助

# 序 言

包伟民

2017年10月21—22日,由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承办,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宋史学术前沿论坛”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40多人,包括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大部分理事,以及一些优秀的年轻学者。这是根据会议发言录音整理的“会议总结”,今代作会议论文集的序言。谨此说明。

最初戴建国先生跟我商量,计划召集这次会议的时候,我提起了十多年前有一次王家范先生召集一些研究明清江南史的学者,在浙江海盐的南北湖开座谈会。开始王先生说我们就是聊聊天嘛,大家也很轻松,所以都去了。座谈中,每人各自回忆自己是怎么介入明清江南研究这个学术领域,学术思想怎么变化演进,等等,其实就是梳理那个领域的学术史。会开完以后,老先生说大家讲得很好,回去每人都写一篇吧,大家这才发现都中了老先生的套路了。当然,后来就有了老先生主编的那本《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颇受学界好评。所以我就跟戴建国先生提了那个会的形式,觉得不错。

但是就我本人来说,我来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提交了那篇文章——《近四十年辽宋夏金史研究学术回顾》。写了那篇文章以后,我觉得经过四十年年的发展,我们的确应该对学术史作一些梳理。通过对四十年来辽宋夏金史学术的回顾与反思,考虑怎么样在此基础上来提出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以期切实推进这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水平。我们关于这个会议的思路就是这样形成的。具体讨

论的议题都是戴建国先生提出来的,我觉得非常有针对性。

但是我觉得这次会议似乎意犹未尽,应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也还是可以仿照王家范先生的那个做法,我们可以把参加人员限定在出生于50至60年代的学者,40年代也可以考虑。每一个人从个人角度来梳理自己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的,进去的时候学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怎样发展演变,现在学界的情况和自己现在的认识水平又是怎么样的。如果每个人都认真梳理自己个人的学术史,凑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学术漫谈专集。我想起码这个书是会受欢迎的。

为什么说要将参加者限定在五六十年代生的人呢,因为这一批学者的成长过程,就是在近四十年。这是我国史学发展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段,我们应该梳理它。为什么要把老先生们都划出去呢?当然不是说他们太老了,没有能力作学术史回顾与反思了,而是因为四十年以前他们已经是成熟学者了。四十年来,我们这批人从当学生开始,到现在为止,可能对学术领域的变化更加敏感。这是我总结今天会议的第一个想法。这次会议我们有很多的成果,但是意犹未尽。

第二个想法:我们这次会有很多重要的议题,应该持续关注,尤其是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由李华瑞先生提出来的关于“唐宋变革论”这一页该不该翻过去的问题。刚才很多先生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休息的时候何玉红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对。他认为不管我们用什么概念去替换它,恐怕效果都是一样的。因为“唐宋变革”这个概念影响太大了,总觉得我们还是沿着这条路在走。任何总括一切的概念都可能存在片面性,社会演变的过程却是多方位、多层次、多面相的,很难用一个概念归纳起来。所以目前阶段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我们干脆不再追求一个新的总括一切的概念。至于“唐宋变革”论,大家把它淡化也就是了。

历史既有变化也有延续,譬如耿元骊先生就说从唐到宋土地制度没有变化。这个变化是否存在暂且不论,总之我们以前确实过分强调历史的变革,把它的延续性给忽略了。这也是我写《宋代城市史》结论时想到的。其实历史的延续相当重要,甚至可以说,变化总是局部的,延续才是主要面相。我们不能仅从一个角度去观察历史。

跟这个有关的,就是戴建国先生提出来的,我们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热门话

题得作出回应。我想起一件跟这个有关的事情，现在的大众传媒，经常传一些关于宋代历史的热门话题，有一些我们没必要关注，有一些还真应该作出正面回答，让一般读者觉得历史学者能力不足倒还不要紧，如果让不当的说法误导了人们对我国历史的认识，就不太好。那就是燕永成先生说的关于史学普及的问题。

譬如说关于宋代 GDP 的问题，尽管现在传播它的多半都是一些不明所以的记者和那些网络写手，但最初提出的人，虽然我们觉得他很外行，但他是学界的人，一个外国人。魏峰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基本的问题已经讲清楚了。但是这种客观论述的文章，根本不受大家欢迎。前两天有人告诉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节目，说宋朝的 GDP 占全世界的 75%，我觉得像这样的话题我们应该有认真的回应，要刷存在感。这两天有经济学家说从宋代开始我们的 GDP 就走下坡路了，不但没有占多数，反而占少数了。我这两天正请学生收集资料，看能不能作一些回应。其实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人口决定论，人口增长，人均就减少了，但是他们用的基本数据可以说百分之百的错误。具体如何回应他们是另外一回事，总之我觉得作为学界中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定的责任感。

第二，也是容易提出、却不容易回应的一个问题：“大宋史”怎样入手？邓广铭先生提出的这个概念，当然极为重要，但是真正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过我想所谓“大宋史”，恐怕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非要同时做辽宋夏金史的专题研究，身兼数职，这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邓先生提出这个概念的落脚点，在于我们要从一个全局眼光来看问题。你可以讨论宋朝的一个很小的专题，但是不要局限于宋朝的视野，你要考虑到当时几个不同政权同时并存、相互角逐的大格局，这样一来，你的眼光可能就会不一样。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讨论中国女人为什么从宋代开始缠足，伊佩霞教授(Patricia Buckley Ebrey)对此有个解释，她认为当时中原地区汉人在辽、夏、金等政权的压力之下，为了显示自己比他们更加有文化，女人就要显得更加纤弱，不能跟北方的那些“蛮夷”学，得跟他们拉开距离。从某种角度讲，缠足就具有让女人显得更加纤弱的功能。这个说法能否成立姑且不论，但她这个解释是从几个政权角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与传统的仅从程朱理学限制妇女的思路去论述不一样。所谓角度就是一种视野，这么说来，所谓“大宋史”的理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是我们这次会议讨论的第二个比较集中的话题。这是一个

很有意义、但也是比较困难的议题。

第三个比较集中的重要话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比较焦虑的，资料，如何找到更多的资料，怎么样去拓展历史资料。例如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从事唐史研究，强调史诗互证，因为与宋史相比较，唐史的书实在太少了，需要从诗歌中去挖掘历史信息。我们读宋代文献似乎没必要那么辛苦，文集奏章里就讲清楚了，何必去读诗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找到更多资料的话，那些看起来相对冷落的材料就不可忽略。尽管有时候可能只是用新的材料去证明一个已有的结论，但还是有意义的，尽管意义相对小一点。此外，还包括戴建国先生提出来的怎样从一个更广的角度取材，比如碑铭材料，等等，都是。宋代的碑铭肯定比唐代要多，但是目前那些材料还未受到它们应有的重视。

我这里可以补充的是，我读书的时候，邓先生总教导说，读宋史，不懂唐史，是读不好的。这样的认识在那个时候还需要不断强调，到现在恐怕已经变成一个大家认同的常识了。我们要往前追溯，制度渊源才能弄得清楚，但当时大多数的学者还没有这个认识。这也说明，现在我们进步了。

近两年我又开始提另外一个话题，我认为我们也需要往后看，宋代以后历史的演变，能够反过来帮助我们去梳理关于宋代历史的一些认识。宋代的一些历史现象，如果仅立足于当时去观察，可能还不清晰，如果我们看一看它在后世的历史走向，对于它的发展趋势就会相对明了。历史资料也一样。我经常举例，梁庚尧先生大量读明清方志，从明清方志里找到许多关于宋代经济史的资料，我们应该学习。包括大家认为可信度不高的明清宗谱，里面或许也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资料。例如近两年有学者从徽州《富溪程氏祖训家规封邱渊源合编》中发现的南宋宝庆元年的户帖抄件，就为我们讨论宋代户籍制度提供了相当有意义的新材料。

关于历史资料，不能不谈到计算机数据库问题。耿元骊先生提出的新技术如何促进学术进步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相对具有共识的一个议题，那就是大家都认同新技术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它不可能是革命性的，新技术只是新的工具，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研究方法的改进，但不太可能带来结构性的变革。

有一些学者认为，数字人文时代到来以后，传统史学就要被淘汰，历史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觉得这个说法言过其实。王家范先生曾说过，有一个职

业是计算机永远淘汰不了的,就是历史学家。这当然毫无疑问。虽然我们要拓宽取材的视野,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新技术,但是历史学家核心的能力还在于细心体会基础的历史文本。在这一方面,计算机数据库——至少就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还是无能为力的。

第四个话题没能充分讨论起来,但是这个话题很重要,那就是吴铮强先生提出的题目,宋史还能谈什么?我一向以为,学术进步主要是由学者的更新换代带来的。我们这一代大约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的中青年学者,思考这个问题的责任比我们要重。

不过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认为一是要重视旧题新做,前辈们所积累的知识需要重新验证,不能假定前辈们的论断全部正确,他们的研究条件,甚至眼光,都会有所不足。而且旧议题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个历史阶段里的核心问题。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永恒不变,我们一代一代人去研究它,是因为每一代人对于历史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旧题新做是一个角度问题。

二是我们应该更多地走向历史细节,不能笼统地得出一个结论,就忽视细节。譬如以前学界普遍认为宋初相权被分割,但是仔细观察当时国家制度构建的细节,很可能并非如此。我当学生时,梁太济先生的授课给了我很多启发。梁先生专修唐史出身,后来从唐史转向宋史,所以对这两段史事都很熟悉,不像我们只是立足于宋史,去读一些关于唐史的二手文献。他说为什么宋史学者总是说宋初设立枢密使分相权,明明唐代开始设立的枢密使,到五代权力都很大。宋初的制度建构,实际上限制枢密使权力,应该是恢复了宰相的权力。我们当时读的那些书,都笼统地说宋初强化君权,设枢密使以分割相权,未能从历史演变的细节去具体论述。梁先生对五代到宋初的史事很熟悉,就看出一些问题来了。

第五,这次会议与以往的宋史专题研讨会不太一样,多了一些关于辽夏金史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尤其是我们这次特地邀请了金史与西夏史的学者程妮娜教授与彭向前教授。我们现在比较有意识,希望能加强与辽夏金史学者的联系。这次会议收到了许多相当出色的专题研究论文,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几篇讨论辽、夏、金史议题的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最后,作为这次研讨会的组织者,戴建国先生与我都为本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衷心感谢各位的出席与付出!

# 目 录

序言	包伟民	1
近四十年辽宋夏金史研究学术回顾	包伟民	1
宋朝分权制衡的治军特点与边防困境	陈 峰	21
盔甲裹诗书：宋代将士文化水平考察	程民生	36
大力开拓文献史料源 不断提升学术创新力	戴建国	64
张载对宗法制度的构思及其“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	范立舟	73
欧美地区的古代中国数字资源概述	耿元骊	89
《宋代登科总录》——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龚延明	108
御殿听政：南宋前期中枢日常政务的重建与运作	韩冠群	116
南宋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光武故事”	何玉红	132
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政治场域中对“华夷”和“中国”观念的 运用	黄纯艳	148
宋史研究中的两个较大问题	姜锡东	174
晚宋理学家的学术视界与君臣理想——以《大学衍义》为中心的探索	孔妮妮	177
高遵裕与宋夏灵州之役的再探讨	雷家圣	189
端正学风厚培功底 宏观、微观研究并重	李昌宪	207
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 革论)	李华瑞	211
加强整体贯通研究 恢复西夏社会原貌	彭向前	254
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学	史金波 关志国	259

从文献学视角审视哲学家——以周敦颐及其文集为例·····	粟品孝	283
宋金《礼志》比较研究·····	汤勤福	289
谈谈我研究宋代货币史的几点体会·····	汪圣铎	313
宋代宗族史个案研究方法浅识·····	王善军	327
行政成本问题与宋代地方政治制度研究·····	王晓龙	333
审计法史的学科地位·····	肖建新	349
宋代史书编传新趋势及其特点·····	燕永成	353
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	虞云国	373
体制分化与唐宋变革臆说·····	张文	386
新不新兮旧不旧,宋史研究方法省思:以制度史为例·····	赵冬梅	390
《宋史辞典》弁言·····	朱瑞熙	396
会议讨论发言·····	赵坤	401
附录 宋史前沿论坛——走出“唐宋变革论”,迈向“大宋史”研究 ·····	饶佳荣	428
后记·····		435

# 近四十年辽宋夏金史研究学术回顾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生活从此逐渐走向正常,学术研究也再次获得了正常发展的机会。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研究,由此得以迅速发展。辽宋夏金史领域也是如此。

不过,相比于中国古代的各个断代而言,40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学术推进尤其明显,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国人对10至13世纪——尤其是赵宋王朝——历史的看法,产生了近乎逆转性的变化。

## 一、时代背景

任何学术研究的推进,都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制约,历史学尤其是如此。因为史家观察历史,于技术、资料等外部条件之外,在思想认识与分析方法等许多方面,更受到他所生活时代的影响与制约。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恒定不变,不同时代的人对历史却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归纳而言,40年来,影响辽宋夏金史领域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大致可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思想禁锢逐步被打破,引领学者观察历史社会的分析方法产生了明显的弃旧扬新现象。传统的经典理论虽然一直被学界所尊奉,不过主要出于对理论教条主义弊病的警惕,尤其在年轻一代学者中间,其实际影响力无疑是减弱了。国门打开之后,在海外学界的影响之下,一些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渗透日深,其中当数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模式

与分析方法,最受本领域学者们的关注。表现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除了对于一些历史现象解释与性质判定产生差异外,最为明显的是研究议题的移易。一些新的研究议题受到关注,传统的、根据经典理论所提出的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核心议题,明显受到冷落。

其次,学术思想的弃旧扬新,主要是通过研究人员的更替代表现出来的。

40年来,在本领域大致有四个代次的学者先后登临学术舞台。第一代是成熟于1949年之前、复经五六十年代思想改造洗礼的老一辈学者,在本阶段前期,他们引领了学术研究的走向,辽宋夏金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同时,一大批在五六十年代接受专业训练的中年学者,作为学术研究的生力军,在经过政治运动长期压抑之后,迸发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促使史学研究很快呈现繁荣景象。他们是第二代学者,大致到90年代中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代学者则以高校77、78级毕业生为主,在“文革”后经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复经研究生课程的训练,从90年代起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学界的生力军。进入21世纪后,更进一步成为本领域学术研究的主导者。紧接着,第三代学者薪火传人,在高校扩招政策的助力下,每年又训练出来相当数量的辽宋夏金史方向研究生。近十余年来,学界在各方面都明显感受到了这一大批学术“新新人类”——第四代学者——的影响。

在讨论议题与研究方法方面,由于受教育背景、政治环境,以及中外学术交流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学者代与代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前期在第一代学者的引领下,从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一些主流学术观念与讨论议题仍占主导地位,例如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重视阶级对立立场与阶级分析方法,坚持社会结构分析中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等等。落实到具体的研究领域,早先的一些中心议题仍然受到不少学者的热捧,例如宋代在“长期延续”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在宋代产生,宋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土地制度,租佃关系,农民战争,宋初中央集权强化与中后期的政治改革,思想史领域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的对立,等等。辽、夏、金史等领域与此类似,例如一如既往地强调它们作为奴隶制国家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议题。从第二代学者开始,议题与方法已经出现某些弃旧扬新的态势,及至第三代学者进入主导地位,新旧之间的更替则成定势。第四代学者基本上是追随其师长的学术路径,而有所拓展。

总体看,本领域前后之间的学术面貌有较大改观。一些旧议题逐渐被以社会史、文化史为中心的新议题所取代。以至近年来有学者综述本领域的研究状况,屡屡提及作为传统研究议题之基础的经济史研究“不容乐观,至少在成果数量上持续走低,后备的研究力量明显不足”<sup>①</sup>;或者经济史中“有新见的论文不多,重复、细碎性研究日趋严重”<sup>②</sup>。与此同时,士人阶层、家族宗法、性别观念、民间信仰、社会生活、基层社会、地域文化、民族关系、思想流派,等等议题,开始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核心概念与分析取向也有不少调整。例如,年轻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精英”这样相对正面的概念,来取代此前“地主豪强”、“猾吏劣绅”之类明显具有贬责意味的用语,以指称地方社会中的权势人物;对于文献中所见之“盗”“寇”“贼”“匪”之类记载,此前大多不加分辨地归为“农民起义”,新近的论著则往往更为审慎地以“民变”一词来作指称。又如讨论历史人物,也更多地将研究目的从此前的“肯定”或“否定”等功过评判与道德审视,调整为对于其多重历史影响的具体分析。

第三,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奇迹般地发展,国力大幅度提升,使得国人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大增,直接促使了学界调整对辽宋夏金时期——尤其是宋朝——历史的看法。

长期以来,根据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说理论框架的界定,10至13世纪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期末端或后期开端,被认为已经走下发展高峰,开始进入衰退期。可是在现实社会经济刺激之下,随着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进入21世纪,以及国际学界出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目的,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帝制后期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这使得中青年学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将其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李华瑞语)。尤其是,正如有学者早已研究证明,差不多已经成为国人共识的、关于宋代国势积贫积弱的看法,是近代学人鉴于当时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反观历史,出于对汉唐盛世的怀念,以及对赵宋王朝国势不振之史的自惕,在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背景之下归纳出来的。近年来国力的增强,使

① 梁建国:《2011年宋史研究综述》,第25页。

② 李华瑞:《201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综述》,第40页;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1期,第40—46页。

得学者们慢慢摆脱那种情绪化的心境,得以相对平静、全面地来观察两宋历史,以充分认识它在经济、文化、学术、技术,等等许多方面空前的成就。

支持宋朝国力积贫积弱看法的一个关键“史实”,是它的武功不振,对外妥协,依靠向周边民族政权交纳岁币来维持边境的和平。近年来,不少论点有明显调整。例如关于北宋向辽国交纳岁币问题,就有学者通过具体分析澶渊之盟的历史影响,例如宋朝从宋辽双方榷场贸易中赢得了超过岁币的商贸收入,中原、契丹人民从此得以和平相处,等等,来否定此前的一些看法。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国人对南宋历史看法的转变。如果说“积贫积弱”是国人对于宋朝的一般性看法的话,那么相比较而言,长期以来,国人对于南宋历史的看法则更为不堪。长期以来加给南宋的标志性指称“偏安小朝廷”,就是一个完全贬义的概念。进入新世纪以后,南宋历史的这种负面形象发生了令人称奇的变化,地方政府开始将其视为难得的文化资源,设立机构,投入巨资,来推动南宋历史的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开始重视南宋历史的意义,强调“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何忠礼语)<sup>①</sup>。

第四,支撑学术研究的外部条件明显改善,这里主要指可能直接影响学者研究条件的资料提供与数码技术的应用。

随着经济的起飞,出版行业也开始快速发展,大量古籍被影印或经整理出版,为学者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研究条件。由于从宋代起存世古籍成倍增加,其中多为孤本善本,各地馆藏情况不一,所以它们对于宋元以下各断代的研究来说,实比隋唐以前各个断代的关系更为密切。例如作为研究宋史最主要史籍之一的北宋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直至它在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各地学者才得以比较方便地应用。古籍影印与整理工作的推进,使得一些原本相当稀见的古籍成了学者们案头的常备书,京沪之外的各地研究人员才逐步在基本资料方面具备了相对方便的条件。同时,因为各地大兴土木,作为它的“副产品”,本阶段所发现的辽宋夏金时期地下历史文物相当丰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其中尤以城市考古领域为突出。另外,一些重要历史资料从域外的引进出版,例如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书,等等,其对相关领域的促

<sup>①</sup> 何忠礼:《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进作用,可为显例。这一切,若非社会经济明显改善,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此同时,近几十年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例如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广泛应用,大规模古籍全文数据库的建设,等等。尽管福祸相依,新技术的应用难免也带来了一些反作用,综合起来看,尤其在近一二十年以来,学科的发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感受到了它的推力。在相当大程度上,新技术使得研究者搜寻资料更为方便,数十百倍地扩大了他们搜寻资料的数量与广度,也帮助了年轻学者得以迅速进入具体专题的学术场景。一些相当冷僻的文献,现在频繁地在硕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目录中露面。如果应用得法,必然对研究带来相当正面的影响。例如学者得以依据更多、更为全面的论据来对史事作出归纳分析,一些原本比较不容易讨论的议题,也有可能变得相对轻松。近年来涉及统计分析的议题,犹如某一词汇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等等,明显增多,可为明证。某些历史现象最早见诸记载的时间,就变得比较容易确定了。

时代背景对于史学研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例如研究者基本的生活条件如何,无疑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国家政治、就业市场、学术管理机制、现实生活中各种“后现代”观念的流行,等等,更不容忽视。不过相对而言,前面所述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它们对本领域研究的影响当然不是一直平铺展开,而是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的。

## 二、概况归纳

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与推动之下,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发展增长差不多是全方位的。若对其中的主要表现作一番概览式的梳理,就可以相当清晰地呈现出来。

首先是关于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

40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增长了数倍,这是本领域学术增长的一个明证,也是它的基础。由于研究者的学术领域常有跨界,人数的精确统计并不可能。不过如果以宋史领域的例证看,参加1980年首届年会者60余人,目前注册的学会会员近500人,其中经常参加学会学术活动的近400人,数十年

间增长了约 6 倍有余,辽夏金史领域的情况不会完全平衡,不过当与此约略相近,可以肯定。

辽宋夏金各个专史都成立了作为学术交流平台的全国性学术组织,明显推进了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古代各断代史领域中,宋史于 1980 年首先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会,组建理事会,指导会员们的研究工作。作为本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交流平台,研究会按每两年一次的频率召开学术年会,并编辑出版年会论文集。自 1980 年至今,已经总共召开了 17 次大规模的学术年会,出版了 17 卷《宋史研究论文集》。辽夏金史领域与此相似。1982 年 6 月成立中国辽金史学会,定期组织召开学术年会。2003 年,转为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从 1987 年出版《辽金史论集》以来,至 2016 年,总共已经出版了 14 辑。西夏史则基本是通过中国民族史学会展开学术活动。本领域主要的学术出版物,有李范文自 2005 年起主编出版的《西夏研究》,前后共计出版了 8 辑。自 2010 年起改为由宁夏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学术季刊。此外,各地还成立有一些地域性的学术组织,例如于 1984 年成立的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迄今已经 30 余年,会员从 40 来人扩展到 300 余人,定期召开学术年会。在宋史领域,也成立有岭南宋史研究会。

这些专史领域的各种研究会,作为学术共同体,是学界不可或缺的学术交流平台,它们所编辑出版的专史论文集,则是重要的学术阵地。虽然近年来由于行政原因,各学术机构大多重期刊轻专集,专史论文集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在学者们的心目中,某种程度上它们仍然起着学术导向标的作用。

40 年来本领域也成立了不少重要的专史研究机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由教育部设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几个研究机构。其中有最初由教育部批准、成立于 1982 年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辽宋夏金史研究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00 年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系列,改名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2000 年,2009 年改名为西夏学研究院),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1 年)。

与此同时,不少学术单位也成立有不少与本领域相关的学术机构,重要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院、吉林大学民族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宋学研